

书名：中国近代历史秘闻

【版权页情况】

出版社：中国建设出版社
书号：ISBN 7—368—04972—5
版本：2005年6月第1版

署名：兰英/编著
电子版定价：5.00元

目 录

金兰之好又如何
蒋介石整人有术
“四丫头”妙经商
孙徐皆免职
步步紧追遭亡
黎元洪借刀杀人
蒋介石坐收渔利
李、白趁火打劫
行不义国民党收买凶手
人去楼空坐愁城
高官厚禄诱学良
孔祥熙皈依基督
蒋介石用人使权术
明升暗降除异己
何应钦拼死效命
幼稚轻信袁世凯
洗净污浊去恶存良
蒋经国子承父业夺党魁
陈诚才疏学浅难提拔
“冷面杀手”遭暗算
精心诱杀韩复榘
活捉黄正诚
投石问路蒋介石挤走史迪威
施绑票计搭进身梯
戴笠猎艳有高招
深入虎穴巧救同志
遭败绩惊慌失措
叶开鑫不战自溃
孙中山失察让位

正文

金兰之好又如何

蒋介石从小生性恶劣，又混迹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种种恶习无一不通，其心狠手毒，无信无义。

可以说张学良是蒋介石的大恩人。蒋介石为了拉拢，曾与张学良拜为“金兰”之好，1930年，蒋、冯、阎、桂大战，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双方都拉拢张学良。张学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手中握有重兵，他站在谁的一边，谁就能获胜。结果张学良带兵入关帮了蒋介石，蒋介石取得了胜利。

那么蒋介石是怎样报答这位“契弟”的呢。

蒋介石先是在爆发“九‘一八”事变时，令张学良不抵抗，从而使张学良蒙上“不抵抗将军”的罪，逼张辞职，逼张出国。张学良回国后，蒋又令张学良带兵进攻革命根据地，与红军为敌，这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用来打击红军，二是消耗非嫡系的杂牌部队。真是一个用心险毒的策略。

忍无可忍的张学良终于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拘禁蒋介石，实行兵谏。

张学良是十分讲究义气的人，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欲回南京时，张学良表示要护送蒋介石直到南京。

张学良是光明磊落的，是不失英雄本色的，他显然已经置个人危险于度外，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手下时，手下全体反对，但他仍坚持要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张学良没有将他的决定告诉周恩来，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急忙赶到机场阻止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结果，张学良被拘捕了，他未能回到西安，1936年年底，蒋介石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

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国民政府1937年5月核准。但蒋介石同时要求特赦。

1月4日，张学良被特赦。

张学良被特赦，但仍被严加管束，蒋介石的宽大是可怕的。

蒋介石“用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始终未被起用。反倒是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

张学良从38岁被关到83岁。蒋介石对恩人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整人有术

权力的扩张

偶然的一个契机，使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这就是三·二〇事件(或中山舰事件)。

三·二〇事件的当事人，海军代理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此时受留党察看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对派了

——陈独秀语)接到一封函件，如下：

军校驱省办事处要舰公函(此函已由海军作战科于会审日缴呈会审官)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驻省办事处启

“之龙遂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张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舰长。该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等语。”……“未几，邹科长(海军局作战科长)又对之龙说：(俄国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否，因俄国参观团要参观该舰。”之龙遂一面饬给养给发新军衣、一面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因是日参观团参观舰队，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当承蒋介石允许故电该舰返省，预备参观。”

中山、宝璧舰 19 日抵达黄埔，是时，蒋介石在省城办公，不在黄埔军校，“抵埠时曾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答云不知，恐为日本商船某事，可稍侍候。……次日邹科长告之龙谓：办事处说蒋已返省，故之龙向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预备参观。”中山舰 19 日下午 6 时 30 分返回广州市。

3 月 20 日凌晨 2 时，李之龙在睡梦中被蒋介石派去的二十师士兵逮捕。同时，蒋介石调动部队，对广州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和其它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部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并派部队对汪精卫的住宅严加“保护”。拘捕了黄埔军校第一军第二师的共产党员 40 多人，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了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

事出突然，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苏联顾问没有一点准备，尤其是对蒋介石发动这场事变的思想准备。

廖案和第二次东征以后，蒋介石在联共、联俄、反帝方面，表现得颇为激进，被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划到左的阵营。1925 年 11 月 23 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首先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又分别开除了所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籍、候补中央委员职务，也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

西山会议派还企图在组织上分裂国民党，他们决议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并推定各部部长，在上海设立中央党部，准备举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于 1925 年 12 月 25 日，在东征前线发表了《告西山

同志书》，严厉谴责了西山会议派分子“驱除异己，发抒私愤之偏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之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改组迄今两载，成绩俱在。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总理于遗嘱中认为，与唤起民众，同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也。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国革命不成，列强敢侮我，皆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最后，蒋介石还有“不为革命，便为叛逆”之语。

1925年10月，蒋介石又把大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

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这场事变，把矛头对准汪精卫、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呢？

蒋介石给军事委员会发了个呈文，全文如下：

“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城，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19日晚前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处置，一面令海军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绪。惟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仅仅因一军舰“露械升火”，“深夜开回省城”，“防其扰乱政府之举”，即大肆发难，戒严省城，缴械俄国顾问卫队的枪械呢？蒋介石说：“事起仓猝，……事前未及报告”，但为什么有调动部队的时间，却无时间向政府报告呢？蒋介石仅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亦无权逮捕受军事委员会直辖的海军局局长。

关于此次事变的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大”的报告中说国民党“二大”（在三·二〇事变前）前苏俄已策动一场倒蒋阴谋，蒋介石说：“但我在当时，只知道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一直到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当时广州的形势很乱，外部的敌人没有了，内部的纷争骤然而起，各种流言、各种传单，到处都有，反蒋的传言和谣言也必然有。加上蒋介石个性多疑，确实可能为流言左右。“过了若干年以后，西山会议派分子邹鲁还津津乐道，说这是他们利用蒋介石多疑的性格设下的圈套，挑拨了汪蒋关系，为搞垮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三·二〇事件的背后，必然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突出的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之争。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二大”以后，蒋介石就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国民党“二大”决议将各军所办的军校合并于黄埔军校后称)，后辞第一军军长，就国民革命军总监职(未就任)，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文一武，成为国民党内两大领袖。

蒋欲去汪而代之，汪精卫亦不甘心只作挂名的军事领袖，积极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就构成了蒋汪矛盾。

蒋介石二次东征时，汪精卫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代理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王懋功原本是许崇智的亲信，投靠蒋介石而升为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卖主求荣之人，蒋介石在内心是鄙视和刻意提防的。“二大”时，汪精卫又提议将王懋功选人中央委员，蒋介石以军人不宜选人中央相抵制。汪精卫在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内培植个人势力，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3月20日事变后黄埔军官学校召集之第一军卸职党代表会上讲话时说：“政府有人想利用他的部下(王懋功)来背叛他，故意将第七军不设而设八、九军，以为诱动王懋功背叛之用，便是蒋介石之招供”。

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出其不意扣押了王懋功，2月27日将王送往上海，当日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撞扰，至此略安定矣。”28日：“神态稍宁，夜始宁寐。”

廖案以后，汪精卫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汪当时是著名的左派领袖，经常到黄埔军校给学生讲演，汪个人的风采，激进的言行，很受青年学生，尤其是左派学生的欢迎。是时，青年学生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孙文学会，双方冲突很大。张太雷在《反动派在广东活动》一文中写到：“广州学生成立了两个学生会，两派学生动不动就用武挥拳。”汪精卫经常加以调解，而蒋介石一向视黄埔军校为自己的私人领地，岂能容他人染指。

蒋介石积极寻找机会打击汪精卫，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三·二〇事变的内幕情况如何不得知，而蒋介石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精卫终，则为不易的史实。”陈公博在《苦笑录》中引用了谭延闿的一句话，“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

其次，是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和中共的矛盾。三·二〇事变之前，应当说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对这位年青的军事家颇有好感，陈独秀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行动。”没有苏俄顾问和共产党的支持，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会上升如此之快。

1926年1月1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6人，共产党人占100名左右。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毕，全场起立，“某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

党国奋斗”。会上，蒋介石以 248 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52 票，废票 3 票，有效票为 249 票，汪精卫全票。在国民党二届一次执委会上，蒋介石又当选为 9 名常务委员之一。

中央和苏俄顾问根本无倒蒋、反蒋之意。陈独秀先生说：

“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革命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又说：“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离奇，最后接周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革命的圈套的。”

在任何内部，没有矛盾是不正常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这些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中共、苏俄顾问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有三个方面。

第一，左派和中共当中的一些年青成员的革命行为与因循守旧势力格格不入，而蒋介石基本属于旧军人出身，居于中间偏左立场，不免对危害自己在军队中独裁的行动发泄愤慨。

苏联将军加伦在《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中：“黄埔军校及其对广东省政局的影响”部分，谈到黄埔军校，尤其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其浩大政治声势和行动，“对于启发其他陆军学堂受压迫学员的政治觉悟所起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致程潜将军的湘军讲武堂的学员在 1924 年 11 月底纷纷要求立即将学堂并入黄埔军校”。并“带上全部枪支弹药，毅然归附黄埔军校”。同时，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还支持农工运动，进行反帝反宗教的宣传。这一切，都引起了军阀们的恐惧，“12 月，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廖仲恺(原文如此，恐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或大本营秘书长之误)，要求制止黄埔军校旨在动摇军心和败坏军纪的有害宣传，他们这个要求道出了军阀们的普遍心声。范石生还认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个有害团体，并且扬言：如有人在他的部队驻地散发传单，将格杀勿论。”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另一部分青年的党员和少壮的领袖却是‘跨党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信仰不同，背景各异。……不过他们多半是青年分子，对革命狂热奔走，极少腐败分子掺杂其间。”又说：“大体说来，我当时对广州方面所谓的跨党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坏。他们都勤劳刻苦，热情洋溢。虽然和我们信仰不同，难免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对他们任事作风却很佩服。不过当时的崇俄风气却使我不满。”

第二，苏俄顾问和中共领导在政策上存在——一些“左”的错误，激化了矛盾。三·二〇事件发生时，率领苏顾问观察团的布勃诺夫总结道：“苏联顾问对参谋、军需、政治的集中管理太快，在中国军官的脖子上形成了参谋部、军需部、党代表和顾问五个套子。”这种情况和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毫无共同之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书中写道：“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是使蒋氏产生反感的重要因素，

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身负不凡的中国军人不快。”

其次是蒋介石同中共领导人及苏俄顾问在北伐上的分歧。蒋介石是力主北伐的，在国民党“二大”上，他就提出了北伐问题。1926年4月24日，在《国闻周报》上蒋介石给他同学的信中坚持说：他在其他问题上均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唯独在北伐问题上他不能让步，还说他从1925年底就已拟定好北伐的计划。从这点和以后北伐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蒋介石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蒋介石的计划遭到苏联顾问的反对。蒋的日记记载道：

二月二十二日晚赴俄顾问宴，席终坐谈、多主北伐从缓。

三月十二日季山嘉就谈，及陈北伐之利，蒋公力避谬妄。

陈独秀在7月7日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提出：

“在国民政府内部的状况上，在整个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的战斗力及革命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北伐而是南伐。此文发表引起了蒋介石集团人物的反对，蒋介石为此在8月24日给国民党中央一份电报，要求国民党向中共澄清这一事实。

在北伐的路线上，蒋介石也与苏联顾问发生了严重分歧。苏联顾问主张，北伐打到武汉后，继续向西北挺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而蒋介石坚决主张出兵东南沿海。鲍罗廷北上北京后，1926年2月，继任鲍罗廷的季山嘉又建议蒋介石从海路运兵北伐，并力劝蒋介石到北方帮国民军练兵，汪精卫也支持季山嘉的建议。蒋介石认为苏俄顾问和汪精卫联合起来想挤走他，这才有以后“想劫持他至海参崴”的荒谬猜想。

2月9日，蒋介石又使出惯用的“以退为进”的手法，请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拟定了公开的电报稿。原以为一定会像孙中山先生在世时那样受到挽留，这样可以提条件、讲价钱。不料汪精卫既不照准，也不挽留，这使蒋介石更以为苏俄顾问和汪精卫联合起来逼他下台，矛盾由此激化。

再次是改革过急，特别是在党代表的权力设置上。蒋介石反对在军内设置党代表制，加伦将军于是提议把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中央执行委员会确认军内设立党代表是必不可少的。隶属总顾问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不仅拥有行政及经济的权力，而且拥有监督作战的权力。蒋介石出于无奈，只好在形式上同意。“军队党代表和军事指挥官之间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其部分原因是新任命的党代表大都是刚出校门的年轻指挥官，刚出校门，就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这使军事指挥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条例不仅使军阀感到不快，即对蒋介石来说在自己权力的实施上增加了约束，况且主管党代表工作的又是汪精卫。

综观此事件的全过程，事因起于蒋介石多疑的个性，与汪精卫争夺权力是他的主要目的，打击共产党和苏俄顾问是事件发动

的最好的理由，迎合了右派打击左派的想法。联合一派打击一派，反之亦然，是蒋介石权力技巧的突出表现。这时的蒋介石180度大转弯，完全右转了。

事变发生后，3月22日上午，苏联领事馆人员询问蒋介石，此次事变是对人还是对苏，蒋介石回答是对人不对苏。领事馆人员对此答复很满意，表示蒋介石对之不满意的季山嘉等顾问，可以离粤回国，苏俄的退让使蒋介石在精神上先胜一招。汪精卫对蒋介石胆大包天的举动“异常气愤”，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把李济琛、朱培德、谭延闿找到，要求他们扣留蒋介石，但各军长未予表态。李宗仁回忆道：“我们也不知党中内争的低蕴，只觉当时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国顾问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几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籍的风气相对照，自然获得我们多数人的同情。”

汪精卫3月22日上午10时在床前召开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议：季山嘉等苏俄顾问暂时离去，欢迎鲍罗廷返回广州；汪精卫患病应予暂时体假；李之龙因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同日下午蒋介石又去找谭延闿、李济琛诸军长，谈制裁苏俄顾问和共产党问题，因上午中央政治局已作出决议，故均表示赞同。25日上午，汪精卫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完全隐匿起来。这样，此次事变，如周恩来同志所言，蒋介石在“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了极大成功”。

事变出乎意料的成功，按常理，蒋介石本应将政变继续下去。“但是，他们(指蒋介石及其支持者)还不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同强硬的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对抗。他们已经赢得了宝贵的地盘，现在该是利用左派出乎意料的弱点的时候，巩固已取得的成绩和做最后摊牌的准备。”

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在广州的左派和中共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需要他们的支持。对待苏俄顾问，蒋介石既不想冒违反孙中山先生即定的联俄政策的危险，亦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张国焘说：“谭(延闿)曾指出广东如得不到苏俄的军火援助，国民革命将成为空谈。蒋氏不会放弃联俄政策，我们似不难从谭的这句话中获得梗概。”同时，汪精卫的出走，到处都是反对“新军阀”的呼声，也给了蒋介石相当大的压力，蒋介石又需要用他惯用的技巧：以退为进了。

3月26日，蒋介石给汪精卫写信，要求“请假”、“休养”，跑到虎门静观事态，广州群龙无首，汪精卫寻不到踪迹，宋子文代表各军军长前来劝驾，蒋介石忸怩一番，回到广州主持大局。

“三·二〇”事件的风波已渐平息，环顾左右形势，为免于自己陷于被动，除请辞处分外，蒋介石还释放了李之龙，宣布此事件纯属“误会”，并表示惩罚事件的制造者。如此大的一场事变就这样被轻轻化解了。

从“三·二〇”事变中，蒋介石看到了国民党中央与左派的软弱，看到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的退让，他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权力了。

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予以解决。

同月，蒋介石还授意邵力子(已登记脱离共产党)出访苏联，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完全以蒋介石为支持对象，即使帮助共产党，也要通过蒋介石之手。苏联的答复是：“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4月16日，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任命蒋介石为军委主席的任命，但遭到隐匿在广州某处的汪精卫的反对，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4月20日，蒋介石设宴送别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蒋介石即席讲话。讲话中依据几条所谓的事实，对共产党进行诋毁。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见到了这份“校长宴请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和事实”的书面材料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批驳他的种种无稽之谈。

“先生所举的种种阴谋之第一事实是：‘有人给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它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说：土耳其革命完成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统统引起了二般军官恐怖与自卫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之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党分子之意志。”

蒋介石所举的第二个事实是“王懋功倒蒋”事件，陈独秀反驳道：“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

右派颇为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或吞款，或者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种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地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陈独秀解释道：“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了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

蒋介石所举的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的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陈独秀在信的开头写道：“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

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远不能任意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我还有不忍心说出的事，我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快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丝毫不必掩饰。因为先生说出来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应当如此。”

在信的最后，陈独秀写道：“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帮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这真是知言)。……至于倒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的革命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于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出卖革命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陈独秀的信发出后，蒋介石在“关于‘中山舰事件’一文”中声称：“我在3月18日党代表宴席上的讲演，曾再三声明，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

4月29日，苏联顾问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依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对蒋介石采取半妥协的态度。5月1日，鲍罗廷和蒋介石继续讨论了4个小时，主要对北伐问题争执很大。5月14日，蒋介石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合作协定，双方分歧很大，但到5月15日举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形势却起了变化，蒋介石的提案得到了顺利通过。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和苏联顾问接受了蒋介石的主张呢？

鲍罗廷返回广州的当日，胡汉民也回到广州，蒋介石首先和胡汉民彼此交换了意见。5月3日，蒋介石和胡汉民一起参加了政治委员会会议。5月5日，国民政府由代主席谭延闿主持，设宴欢迎胡汉民，胡汉民在会上发表演说，而鲍罗廷一言不发。广州的一些右派分子利用胡汉民和蒋介石的来往，大肆宣传国民政府将任命胡汉民为国民政府总理，有的说胡汉民将再度出山，要造成蒋胡合作的局面，并扬言要大举反共。胡汉民本人也公开发表反共言论，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并对蒋说鲍氏系为解决“三·二〇”事变而来，主张予以逮捕。胡汉民等右派人物猖狂反共，蒋介石却于5月4日决定继续聘鲍氏为总顾问。这样，在鲍罗廷面前出现了：蒋胡合作反苏反共；和蒋介石维持合作。只有选择后者，而且必须在国共协定问题上予以让步，放弃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的局面，让蒋介石独掌中枢。在鲍罗廷和蒋介石达成协定的情况下，5月9日，胡汉民离开广州去香港，11日，汪精卫离开广州赴法国治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汪、胡、蒋三人争做国民党的最高头脑，却不料被后起的蒋介石抢了先。

5月14日，蒋介石与鲍罗廷继续会谈，鲍罗廷对蒋介石的

“整理党务案”仍持异议。就在这时，广州出现谣言：政府将在5月15日实行共产，商民将进行罢市。中央银行出现挤兑现象，国民党右派又借各界代表名义向蒋介石请愿，要蒋制止共产党活动。鲍罗廷认为：广东局势非常危险，很可能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指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在这种情况下，鲍氏派张国焘、谭平山去见蒋介石，决定对蒋实行让步，并支持他关于北伐的主张，但要蒋对右派采取措施。

5月15日至22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由蒋介石主持，5月17日通过了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同时又通过了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即蒋介石4月3日提交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件》议案，此议案共九条，如下：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之1/3。

四、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有[有字衍]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5月19日又通过了“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

5月20日又通过了“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

5月22日，又通过了“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案”，并改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任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辞去了所有的部长职务。会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决定北伐。

5月25日，又通过了“整理党务宣言”。宣言冠冕堂皇宣称：“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对于本党党员及全国人民，亟须明示本党决不让帝国主义与军阀利用反共产之口号以摧残国民革命，乃一致接受整理常务案，以消灭对于合作原则之真正目的之怀疑。”会议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在蒋介石提议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

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本人接替共产党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会上，共产党代表谭平山、林祖涵采取容忍的态度，未予表态。

三·二〇事件发生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他们所谓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闻讯后致电蒋介石，祝贺他“清理党籍”的行为，没想到，蒋介石立即发出通电，严厉谴责西山会议派：“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残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西山会议派讨了个没趣。

5月27日上午，经蒋介石与鲍罗廷协商决定，肃清右派，囚禁海军学校校长欧阳格、新编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免去王柏龄二十师师长和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职务，迫走广州市长伍朝枢、政治委员兼广东民政厅厅长古应芬。这样，国民党中央政权除蒋派系统的人外，近乎于真空。

7月4日至6日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并通过了“国民革命军的出师宣言”。会议因张静江患足疾辞职，决定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推选他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此外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负有指挥国民政府所辖军队并任命军事长官和党代表之权。

这表明蒋介石已通过合法的形式，取得了党政军大权，独裁体制基本形成，蒋介石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四丫头”妙经商

“四丫头”——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和影片《湘西剿匪记》中的那个狡诈狠毒的国民党女特务、女匪首，许多人大概都不会忘记。

“四丫头”的原型是乌龙山下一个叫做黄玉娇的女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湘西光是有组织的土匪武装就有108股，黄玉娇是在芷江师范读书时，被一个叫做曾西胡子的土匪头子抢上山做所谓“压寨夫人”。

1957年，落入法网的黄玉娇被劳改机关释放，与乌龙山下一个农民结为夫妇。1979年，当改革的春风吹绿了乌龙山时，黄玉娇萌发了经商致富的希望。黄玉娇家毗邻安江镇，附近山区的农民进城买卖东西都要从她家门口经过，或者在那里歇歇脚。但是，经商需要本钱，黄玉娇先是卖冰棍、卖瓜籽，不到两年就赚了两千多元钱，然后以这两千多元钱做资本，在自家破茅屋的基础上，盖起了“玉娇商店”，卖副食百货。黄玉娇以诚待人，童叟无欺，买卖日渐兴隆。

“‘女匪首’开商店了！‘玉娇商店’就是……”

黄玉娇开商店的事很快在乌龙山下传扬开去，人们将信将疑，都到安江镇来看个究竟。“玉娇商店”越发红火。

不久，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电影《湘西剿匪记》相继问世；随后，湖北《知音》杂志披露了“四丫头”的真实面目……

黄玉娇名声大振，“玉娇商店”名声大震。

黄玉娇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名人”，也意识到这种“名人效益”正是自己的商店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的重要原因，她每天笑脸迎送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顾客”，让顾客将惊诧、欢喜、回味和感叹连同她商店中的货物一齐带走。

几年过去，“玉娇商店”由木板房变成了瓦房，玉娇由一个昔日的“压寨夫人”、乌龙山下的普通村民成了今日地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先进分子。“玉娇商店”的年营业额也由几千元增加到几十万元……

孙徐皆免职

袁世凯撒手归天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表面化。袁世凯政府中的北洋系核心人物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都想继任大总统，三人各不相让。最后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之下，段祺瑞假借“大总统告令”，宣布依“新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北京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段祺瑞顺理成章，任国务总理。

黎元洪、段祺瑞两人表面上相互支持，一唱一和，好似融洽得很，实际上是互存戒心，设法控制对方势力的扩张，以免对自己构成威胁。

是时，二人均有一得力助手。

内务总长孙洪伊是黎元洪的高参。为再造共和，孙洪伊奔走南北游说，深得黎元洪赏识。黎继任总统，遂任其为内务总长，每日里在总统府内参与议政。黎元洪接待来客，孙洪伊也常常是坐在黎元洪的一侧。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乃是段祺瑞之高足，洪宪帝制之前，已在段祺瑞手下效力，忠心耿耿。段祺瑞继任总理后，徐即任秘书长，今天建一议，明天献一策，往往都能言段之未言；说段之未说，甚至一些内外政策，段也是惟徐言是从。国务院中人皆称徐树铮为总理第二。

孙洪伊、徐树铮各有主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孙、徐二人是明争暗斗，互相吹毛求疵。

一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孙洪伊参与，便高谈阔论，引古论今。谁知正说得兴致高涨时，忽听一人嚷嚷道：“孙总长，你不要目中无人哩！须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夫千虑，也有一得。难道除你以外，别人就没有见识了么？”

孙洪伊转头一看，正是冤家徐树铮侧目以待，对其不屑一

顾。孙哪能受得住这番讥讽，即冷笑道：“足下大才，我很佩服，但今天是阁员会议，待足下入阁后，再来参议也不为迟。”一句话将徐踢得远远的。

徐树铮被他这么一嘲笑，不由得愤然道：“国务院秘书长也是国家一官，况且国体共和，无论何等人民均可言事。孙总长平时谈共和，怎么现在却效法帝制，禁止旁人议论呢？”

二人是由争到吵，相互揭短，恶语相对。

孙洪伊依仗总统门面，竟怒向冷冷坐在一旁的段祺瑞道：“总理为何用此狂人？若再纵容下去，恐怕总理也要失望了！”段祺瑞见孙洪伊如此放肆，脸色顿变，阴沉着脸道：“这里是会议场，不是喧闹场，孙总长未免太失体统了！”言罢，拂袖而去。

第二天，段祺瑞怒气冲冲，进入总统府，指责孙洪伊的无礼。

哪知黎元洪淡淡道：“孙总长性子太急，徐秘书长也未免太欺人。”实际上是说徐树铮的不是。

段祺瑞见话不投机，便生气道：“孙总长是府中要人，树铮不过是院中一委员。总统如果以为树铮欺人，不但树铮可免去，就是祺瑞也不妨辞职。”

黎总统也道：“我也不愿做总统，无非是为国家利益考虑，望总理不必多心。”

二人不欢而散。

经此波折，黎、段二人几日不通音信。

交通总长许世英，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回事儿，认为此事必须有人出面调解。最佳调解人选，只有三朝元老徐世昌再合适不过。

徐世昌得了函请，不忍坐视，递进京调解。

黎元洪、段祺瑞各不相让，谁都知道，孙、徐之争，实际上就是黎、段之争，哪能让步？

经过再三周旋，段祺瑞提出：必须免去孙洪伊。

黎元洪也不相让：必须辞去徐树铮。

双方你一来，我一往，一个星期过去仍未解决。

徐世昌纵观局势，觉得只有将孙、徐二人都免去，才能平息争斗。

凭着三朝元老的身份，建议折中处理：将孙、徐二人同时免去。黎、段默许。

11月20日，孙洪伊免职。

11月21日，徐树铮免职。

黎元洪断了一只臂，段祺瑞也去了一条腿。

黎元洪、段祺瑞表面上合作，内里却是勾心斗角，阻止对方势力的壮大。而设法去掉对方得力帮手，是关键的一着。所以，当段祺瑞要去掉黎元洪的一只臂膀——孙洪伊，黎元洪当然也要将段祺瑞致残——清除出徐树铮。结果，一人断了一只臂，一人

断了一条腿，心理平衡，势力上也平衡了。

步步紧追遭亡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另一个方向是山东解放区。山东和陕北，是中共领导的整个解放区的左右两臂，如果国民党军占领了山东解放区，就折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左臂。

国民党为了实施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组成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的兵力，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机动兵团，担任主攻任务；并以第二、第三绥靖区的部队相配合。一时用于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总兵力达 19 个整编师 46 个旅(后又增至 24 个整编旅)。

从 1947 年 3 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就疯狂发动进攻。自恃兵械精良，趾高气扬，气势汹汹，丝毫不把我华东野战军放在眼里。

5 月初，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苍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于是华东野战军把主力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国民党军事当局据此判断其为向东北方向“溃退”，遂急令汤恩伯兵团迅速攻占莱芜、沂水、苍县一线；王敬久兵团向博山、张店方向进攻；欧震兵团则集结于新泰、蒙阴地区，随时准备进击。企图一举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

陈毅痛歼张灵甫七十四师，蒋介石说：“这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汤恩伯兵团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依仗美械装备，前进积极，态势突出。该部行至孟良崮时，才醒悟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汤恩伯自恃该军战斗力强，地形有利，居高临下，电令师长张灵甫：“匪来犯我，实难得歼匪之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随后，蒋介石争调十个整编师向蒙阴、青驼寺集结，增援第七十四师，想乘此与华东野战军一决雌雄。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援军被我军狙击，始终无法同第七十四师会合，而第七十四师被围打得哭爹叫娘，受惊四处奔窜，混乱一团，这支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七十四师也逃不出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被击毙的可悲下场。

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之精锐七十四师如巨石入水，在国民党内部造成极大震动和恐慌。蒋介石哀叹：“我以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被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不仅老蒋哀叹，连美国人也垂头丧气地认为：“1947 年共军胜利击退政府向山东共区的大进攻，标志着战略的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共军手中。”

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南京国民政府绞尽脑汁，“动员戡乱”，但“君有疾在骨髓，

不可治也”。内乱蜂起，人心惶惶。国民政府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蒋介石向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碰了钉子。这一硬招不成，他眼睛一转，又有新招。

黎元洪借刀杀人

所谓借刀杀人，就是自己不出面，用别人之口去陷害他人，或借别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对手。

此计属于腐朽的尔虞我诈之术，在旧时的官场乃至民间几乎处处可闻。这里以黎元洪借刀杀张振武为例。黎当上了副总统之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与湖北地盘，绞尽了脑汁，他首先考虑的，就是那些曾经帮他拉他的人。认为这些人有功而骄横，有时不把他放在眼里，影响对他的威信。乘着湖北截兵复员之机，黎元洪以收束军事为名，逐步解除与限制了这些人的兵权。对于一些主要人物，黎元洪则将他们推荐至中央，请求袁世凯给以有名无实的官位。张振武，就是其中之一。

张振武是湖北武昌起义的功臣，是著名的“三武”（孙武、蒋决武、张振武）之一。他曾任湖北都督府军务部副部长，平时对黎元洪颇不礼貌，故而黎元洪对其怀恨在心，视若眼中钉，黎元洪便把张振武推荐到北京，袁世凯给他封了个“蒙古调查使”的空衔。张振武上任之后，整日无事可做，闷闷不乐，便又回湖北来，经常跟往日的袍泽往来。这时，湖北也有“二次革命”的风声。张振武不满现实，不免发发牢骚。黎元洪觉得这对自己很不利，但是又不能直接杀掉他，怎么办呢？黎元洪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用好言规劝张振武再去北京，同时又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加害张振武，请求袁世凯将张处死。

袁世凯接到电报之后，便知是黎元洪“借刀杀人”之计。但他不露声色，准备将计就计，干掉张振武，因为干掉张振武也是去掉自己一个心腹大患。于是，袁世凯便对下面做些布置。张振武一行到北京之后，从8月11日至13日，由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轮流设宴招待，以淮军老将姜桂题为首的北方军人，联合发起南北袍泽大会，热烈欢迎张振武一行。袁世凯也亲自设宴招待，气氛非常融洽。张振武等倍感亲切，毫无戒心。

元洪见北京方面不但毫无动静，反而热闹非凡，便满腹猜疑，便于13日又发来一份急电，催促袁世凯从速下手。

14日，张在六国饭店大宴参议院同盟会、共和党两党议员，这一行动向世下说明，张振武搞的是“南北一家”，而不是什么“二次革命”。

可是，15日一大早，张振武、方维与湖北将校团一行13人突然被军警逮捕。当天，由军执法处处长陆健章亲自审问，张、方等人深感不妙，竭力辩护，但军方还是在当天判处张、方二人以死刑，并在当天执行。同时，京师步军统领则宣布张、方二人的罪状，并把黎元洪打来的密电一字无遗地照录出来。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北洋政府公开非法杀人的第一刀，地点

在首都，被害者为武昌起义的有功之臣，主使者为副总统黎元洪，执行者是大总统袁世凯。此案发生后，各方人士纷纷议论。由于张、方二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有人便开始怀疑袁世凯将要杀尽革命党人，为清朝皇帝报仇。此时正在北京城的湖北另外“两武”吓得不得了，便于17日到公府求见袁世凯，要求给以“免死券”，可见这一血案已闹得满城风雨，革命党人人自危。

上海同盟会方面，首先由黄兴打电报质问袁世凯：“杀人总要有罪状，如果张、方二人确有死罪，就请政府拿出真凭实据来。”北京方面，同盟会参议员张伯烈提出质问：“如果没有罪状，政府何得擅杀革命有功之人？”可是，袁世凯在回答参议院的咨文中却轻描淡写地说：“贵院要求提出张、方二人罪状，当令黎都督查明具备。”

袁世凯不仅把杀人之罪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发给张、方二人遣孀的抚恤金各3000元，并将被捕的湖北将校团团员全部释放，各给1000元为回籍以资。通过这些做法，果然全国的舆论为之一变，对袁世凯的怀疑变为谅解，认为他是处于被动地位，碍于副总统的面子，不得不诛杀张、方二人，而使他自己做了替罪羊。在此之前，全国舆论曾经骂袁世凯是当代最凶恶的刽子手，最狡猾的政治阴谋家，而称赞黎元洪是忠厚长者，和平天使，通过这一血案，大家才又认识到“忠厚长者”的阴险毒辣，并不在杀人魔王之下。

蒋介石坐收渔利

蒋介石看问题看得远，总是在事情发生前，就着手行动。在北伐中，他就看到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会成为他的主要对手，于是就施用挑拨离间的阴谋，以造成三者的不和，以便在后来各个击破。

1928年，蒋介石主要挑拨了李宗仁与程潜，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加剧了他们的矛盾。

1928年2月，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之外，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就任政治分会主席。

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将冯玉祥、阎锡山所属部队的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成立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任(何应钦代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实际上，蒋介石提拔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是为了加剧李宗仁与程潜的矛盾。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湖南省有比较强的实力，在打败唐生智的战役中，立功很大，军队开入湖南。

程潜很早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资格老，李宗仁无法与他比，程最适合担任武汉政治分会的主席，若程任主席，李宗仁也不好说什么，但蒋介石偏偏让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

果然这次任命发表之后，程潜大为不满，李宗仁也不敢就